

乡村视点

赋能乡村振兴 “科技小院”作用大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党的二十大对建设农业强国作出部署，希望同学们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回信。

时隔一年，今天科技小院又取得了哪些成绩？经历了哪些故事？对各地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能发挥哪些作用？对此，记者进行了一番探访。“一个院落，几间农舍。”从2009年建立第一座科技小院至今，全国已建成1800多个科技小院，157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参与其中，2700余名研究生指导教师和产业专家、1万余名研究生常年驻扎在乡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头连着高等学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不仅蕴藏着科技创新的巨大能量，而且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科技小院



蘑菇小院，是北京市副中心“科技小院”，2020年，在市、区统战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借助科技创新，发展农业庭院经济。村民可以居家就业，增加家庭收入。 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

现在——1800多个科技小院遍布全国

时间回到2009年，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省周县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科技小院——白寨科技小院。“创建科技小院的初衷是想把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派驻到农业生产一线，以‘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零费用’的‘四零’模式，为农民提供科技培训和服务，切实研究解决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科技小院创始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如是说。

一个院落、几间平房、三两学生，是科技小院的“标配”。15年过去了发展如何？

在北京，全市共建成87家科技小院(覆盖10个郊区)，2023年共助力当地集体经济及农民增收2500余万元。北京市政协委员、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斌举例道，门头沟白虎头科技小院，打造“百枣园”，推动林果经济发展，2019年底，白虎头村提前实现了全员“脱贫摘帽”，人均收入达到4万元以上；通州区富各庄村制定了蘑菇主栽品种(平菇、榆黄菇)+珍稀特色品种(白灵芝、黄金金针菇和秀珍菇)的搭配生产模式，带动庭院种植食用菌60户，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房山区东石山村，积极推广草莓高架无土栽培，每亩增收8000元，解决当地和周边农户200余人就业……

数据显示，2023年，北京市科技小院所在村集体收入在50万元以上的村已达45个，占比55.5%，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村有32个，占比39.5%。全年解决就业2400余人次，引进、推广菊花、牡丹等新品种220余个，集成、推广各类节水、施肥等新技术180余项，示范带动18万余亩。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众多科技小院所在地。在江西，11个设区市先后建立了61个科

技小院，围绕江西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重大需求，建设了涵盖稻米、蔬菜、果业、畜牧业、水产、茶叶、中药材、油茶等主要产业的40多个乡村产业。江西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院长胡国良举例说，比如，彭泽虾蟹科技小院以服务小龙虾产业集群为重点，将发酵麸皮和土壤改良技术、虾蟹甲壳提取技术等融入全产业链；上高水稻科技小院师生解决了当地双季稻机插技术、优质稻丰产抗倒技术等技术瓶颈，种粮大户姚小军采用小院师生研发的技术，平均亩增产50余公斤，亩节本增收150余元。

那么，科技小院给乡村带来了什么？在王斌眼中，北京科技小院建立5年来，按照“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以点带面，连点成线”的帮扶格局。可以说，小院虽小，但做出了大品牌，实现模式可复制；小院虽小，但写出了大文章，实现经验可推广；小院虽小，但育出了大人才，实现效果可持久。

在胡国良看来，科技小院将人才培养，特别是专硕研究生培养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实现了学用有机融合。即在生产一线培育人，“培育-就业”零距离；在农民地里做科研，“研究-应用”零距离；在农民身边做服务，“专家-农民”零距离；在龙头企业做服务，“技术-产业”零距离。真正实现了科学家与农民深度融合，科技与农业产业紧密结合，“输血”(推广技术)与“造血”(提升素质)有机结合的科技小院精准扶贫新模式，突破“最后一公里”难题，提高技术到位率，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此外，科技小院在促进乡村文明建设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通过争取多种资源支持，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提高农民幸福指数，促进乡村和谐发展。”胡国良如是说。

未来——打造国家示范性科技小院集群

“小院”很小，仅是一个院落、几间农舍。“小院”很大，它推动农业发展的新天地，将“象牙塔”与“泥巴地”链接起来。

从15年前，在曲周起步，依托科技小院向农民零距离推广农业技术。如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一个个科技小院在全国许多乡村安家落户、遍地开花，科技扶贫的果实越结越多。科技小院已从科技帮扶的1.0版、产业兴农的2.0版，升级到乡村振兴的3.0版。这个模式已经在31个省市自治区得到推广，真正成为高校与农村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紧密结合、“输血”与“造血”有效结合的精准扶贫新模式。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广科技小院模式，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专家服务农业农村。”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钟登华提交了一件与科技小院有关的提案，建议布局建设国家示范性科技小院集群。

钟登华将科技小院的功能总结为“拆了4堵墙、架了4座桥，体现出4种品格”，即拆除了学校与社会、学科与学科、教学与科研、教与学之间的墙，架起了学校与乡村、师生与群众、问题与办法、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体现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上下求索、为民造福的品格。“如今，科技小院也已推广到老挝和非洲8国，连续三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作为重点案例向全球推广应用。”钟登华补充道。

从目前来看，科技小院建设发展还面临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钟登华看来，各培

养单位建设的科技小院布局较散，缺乏统筹规划，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需求的作用未充分发挥；大部分科技小院提供的是单项农业技术服务和指导，难以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多技术集成、产业链条延伸等趋势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同时，面对服务农业强国建设的时代使命和各培养单位高涨的建设热情，科技小院现有的建设发展规划与中央文件和国家重大战略的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如何解决？钟登华表示，布局建设国家示范性科技小院集群应对标国家重大战略，加强统筹协调，突出校地协同，以县为单位，布局建设国家示范性科技小院集群，打造“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助力粮食安全和乡村全面振兴。

“围绕服务绿色低碳、人居环境治理等农业发展关键问题，支持在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重点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以及黑土地等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地区、产粮大县等区域开展集群建设。”钟登华建议，支持国家示范性科技小院集群围绕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全方位所需，强化学科协同；支持不同类型高校参与科技小院集群建设，地方政府要在政策投入、服务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健全激励和质量保障制度，在科研项目、基地建设、年度经费预算等方面加大对科技小院的支持和投入力度。

“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江西科技小院建设经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模式。”在胡国良看来，未来需联合依托单位和共建单位，加强对科技小院的管理，进一步完善制度，持续开展科技项目落地，助推产业发展。同时，积极争取各方资源，加大对科技小院的支持力度，积极申报农业科技小院项目。

一线调研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把“乡风文明”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紧迫任务，多次强调要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今年以来，在湖南、重庆、山东，习近平总书记都提到了一个词：“移风易俗”。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民革宁夏区委会主委王新军表示，乡村作为中华民族乡土的根，大力培育乡风文明，对于继承和发扬与人为善、团结合作、邻里互助、勤劳致富等优良传统，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任务，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和力量源泉，新时代以来，我国全面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和‘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在基层落地生根，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擦亮乡风文明‘底色’，塑造乡村振兴之‘魂’，积极引导群众讲文明、除陋习、树新风，以乡风文明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有效促进了乡村振兴整体推进，广大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明显提升。”王新军如是说。

但是，由于地区发展差异，我国乡风文明建设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王新军举例道，如部分地方村民尤其是部分青年村民艰苦奋斗精神、勤劳致富思想和自力更生意识弱化，缺乏正确的就业理念和精神追求，“高不成、低不就”，“等靠要”思想严重；受拜金主义的不良诱导，部分村民家庭责任感不强、婚姻观错位，高价彩礼、薄养厚葬等陈规陋习不同程度存在，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等不文明行为蔓延，不赡养老人和不抚养孩子的现象时有发生。

“此外，部分农村集体观念淡薄、邻里关系淡化，一些村民只讲权利不讲责任，衍生出一些‘无公德个人’和‘无义务个人’，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正常的乡村结构，成为横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绊脚石’。”在王新军看来，上述这些问题亟须用文明乡风涵养正气，留住乡情乡韵，让乡村振兴在广袤的农村落地生根。

如何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王新军表示，乡村振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培育新时代乡风文明是一个综合、全方位、系统性的工程，需要突出重基层的理念，在加强道德引领的同时强化法治支撑，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切实把乡风文明建设引向深入。

为此，王新军建议：一要加强正面引导创造有利环境，注重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大宣传教育力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身边生动事例大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通过“立”“讲”“传”方式，扎实做好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和乡村文化的宣讲普及和推广，引导广大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让移风易俗“活”起来，乡风文明“兴”起来，在潜移默化中一点一滴地构建起基层善治和乡村振兴的新时代文明环境。

二要强化组织管理抓好有效引领。在选优配强村级组织的基础上，做好县乡政府和乡村自治工作衔接，理顺乡村管理关系，厘清具体责任，规范工作流程，让基层真正承担起组织和服务群众的职责，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把乡风文明纳入农村公共服务、村集体经济收入分配、涉农补贴等农村生产生活各环节，发挥基层组织引领力，使之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领头雁”、文明行为的“导航灯”、社会治理的“黏合剂”。

三要突出法治导向提供有力支撑。加大法治与自治融合力度，强化村规民约的“硬约束”。在加强正面引导鼓励的同时，克服“民不告官不究”的惯性，发挥能动司法作用，及时对破坏乡风文明领域典型案例依法予以查处，让背离乡风文明要求者受教育、担责任，以明确的司法导向推动乡风文明建设有力有效实施。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宁夏区委会主委王新军：擦亮乡风文明“底色” 塑造乡村振兴之“魂”

本报记者 李元丽

一周农事

@种粮农民 农业保险建议“应保尽保”

本报讯(记者 李元丽) 5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在全国全面实施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有关情况。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衍表示，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范围扩大，为我国种粮农民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灾害风险兜底保障。

从2004年开始，我国实现了粮食生产“二十连丰”。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39万亿斤，连续9年站稳在1.3万亿斤的台阶上。这个成绩的取得，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农业农村逐步构建完善起了一个针对种粮农民的补贴、价格、保险“三位一体”的收益保障政策体系。王衍表示，这个政策体系调动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在这个体系中，农业保险已经是一个支柱性的政策，为我们种粮农民提供了灾害风险兜底保障。特别是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逐步扩大范围以后，这个保障更加有效了。

这个保障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实施给种粮农民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保的是总成本、全成本。在农民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以后，虽然可能颗粒无收，但是不会血本无归。一定程度上，他所获得的理赔可以有效保障恢复再生产。当前土地流转的比例比较高，去年已经达到了36%，种粮的家庭农场有170多万家，种粮的合作社有50多万家，这个趋势

还在不断上升。所以对这样的保险经营主体来说，上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就有了一个灾害风险的“缓冲垫”，能够大大增加种粮信心。有了底气以后，他们就敢多种粮、种好粮。

另一方面，农业保险为受灾农民提供了实打实的经济补偿。去年农业保险整体赔付了1100多亿元，其中粮食作物赔付了800多亿元，其中粮食作物赔付了800多亿元，其中粮食作物赔付了800多亿元。举个例子，去年东北发生暴雨灾害以后，中华联合财险向吉林省榆树市受灾的种粮农户累计赔偿1.15亿元，其中一个农户种植的722亩水稻全部投了完全成本保险，受灾以后获得赔偿27.95万元。对这样的种粮农民来说，这笔钱就是对灾害损失的最有效补偿，实打实地算入了种粮收入。

基于这样的认识，农业农村部建议广大农民，特别是从事规模经营的种粮农民，很有必要把农业保险作为自己粮食生产风险的重要管理工具，争取做到“应保尽保”。同时，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支持种粮农民实现“愿保尽保”。当然对各个保险机构来说，也要开发设计更加符合种粮农民风险管理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让农业保险能够好用管用。

总的来说，无论是政府部门、保险机构还是农户，都有一个共同愿望，那就是尽量不成灾、努力少损失。在这样的共同愿望下，我们坚决倡导“防救并举、防胜于赔”的理念，希望保险机构能够在“防”字上做更大的文章，与政府的农业防灾减灾政策措施同频联动，共同帮助种粮农户防灾减灾夺丰收。

农遗之光

贵州从江：一水三用、一田多收的稻鱼鸭复合系统

全国政协委员 闵庆文

黔东南层峦叠嶂的大山里，在清澈的都柳江畔，有一片侗族村寨聚居区，称之为“侗乡”，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就在这里。

从江县地处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山地过渡地带，相对高差1535米，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90%以上。就是在这样似乎不太适合人类居住的条件下，人们培育了适宜的水稻品种，将鱼、鸭引入稻田，形成了独特的稻鱼鸭复合系统。2011年，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以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独特的农业生产模式、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于2013年被农业部列为首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这是一种适应自然的生态景观结构。侗族先民在山坡之上保护森林、修建村寨、开垦梯田、挖掘鱼塘，形成了森林-村寨-稻田-鱼塘的复合生态景观结构，具有重要的经济、生态、文化功能与价值。

这是一种环境友好、充满智慧的生态农业模式。空间上，稻鱼鸭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性，占有不同的生态位，摄取不同层次的物质和能量。时间上，人们根据稻、鱼和鸭的各自生长特点，使本来相克的物种和谐共生。鸭食虫、鱼食草，以鸭粪为鱼、鸭提供肥料；稻花可作为鱼的食料，禾苗则为鱼、鸭提供荫蔽；鱼、鸭还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含氧量、通气环境和土壤孔隙度。用配置农田生物多样性的方式，使天敌自然形成，实现害虫的全生物防治。可以防备旱季缺水，即使收获后也保证田块水源不断。

这种农耕方式既可有效节省土地，有效缓解人地矛盾，又可一水三用、一田多收。除了收获稻米、田鱼和鸭子外，还有稻田附近种植的各类作物和蔬菜瓜果，以及从水田内获得的各种食材。

从江历来以“糯禾之乡”著称，更以香禾闻名，有着“一亩稻花十里香，一家蒸饭十家香”的美誉。同时，从江被誉为“民族原乡”，是一个由苗、侗、壮、瑶、水等19个少数民族聚居为主的山区县，少数民族人口占90%。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和谐相处、相互影响，形成了丰富多彩

的民族文，又享有“民族生态文化基因库”的美誉。4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81个“中国传统村落”，就是最好的体现。其中，多声复调的侗族大歌可谓是世界民间音乐之珍奇，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侗族人的生活离不开糯米。农历三月初撒谷种要吃糯米糍粑；四月八要吃乌米饭；五月端午要吃粽粑；祭天和祖先要用糯稻；“吃相思”也要用糯稻来招待客人。侗布织染工艺中的洗沙、染布需要用糯稻秸秆烧成的灰作为原料。

侗族人的生活离不开鱼。在祭祀上，人们以鱼作为首要祭品；农历六月的“初六节”，家家老年人要带一盘炒干鱼、一碗糯饭到自家的“娘田”边祭祀，祈求保佑不壮鱼肥；每年农历十一月的“冬至节”，家家老年人都用酸汤煮鱼或清炖鱼、糍粑祭祖，祈求保佑新年粮食丰收。

侗族人的生活离不开鸭。农历六月十五的“祭天节”和七月的“吃新节”，都要用鸭子来待客；染布需要鸭蛋清来使布光亮；提亲、订婚、结婚都要用鸭，相连的鸭掌寓意着相依相连。

稻鱼鸭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最美的农业生态景观。民居、风雨桥、鼓楼、戏台、禾仓、禾晾等，这些形态各异的建筑艺术珍品，散布于山寨之中，相互映衬，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每年秋季收获后，村寨旁一排排挂满了金灿灿稻把的禾晾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2021年12月顺利通过验收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的加榜梯田，由于山势陡峭海拔高差大，坐落在梯田间的山村吊脚楼与梯田常年笼罩在缭绕的云雾中，犹如“人间仙境，世外桃源”。

今天的从江，以稻鱼鸭为核心，建立了生态农业产业链；充分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品牌，开发认证系列生态农产品；创新农业经营主体，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打好农文旅组合牌，拓展了农业功能；发起成立“稻鱼鸭联盟”，实现共同发展。“稻鱼鸭”已成为从江的一张名片走向全国、走向世界。